

红军“游击天才”余天云之死

□ 据《同舟共进》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位红军将领，他曾被张国焘称为“游击天才”，却又被刘伯承称作“山大王”；他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骨干，曾被众多将领称道不已，后来却被作为反面典型——他就是曾任红四方面军30军、31军军长的余天云。

余天云后来从历史上淡出，原因不难理解——那也是他在长征途中忽然赴死的原因。当长征快要走出草地时，在西康省的丹巴县（今属四川省）一个铁索桥上，一道身影瞬间闪过，余天云在队伍中突然纵身跳下铁索桥，消失在浪涛翻涌的丹巴马河中（一说大渡河上游的大金川）——一个浪花，他永远消失了。

一位红军高级将领，竟用自戕的方式离去，这是为什么？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位红军将领的传奇一生吧。



27岁的军长，脱颖而出的将才

余天云是湖北黄安（后改为红安）人，这里是著名的“将军县”，两任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等许多共和国功臣，都是在这里出生的。毫无疑问，假若余天云不死，他的名字一定会出现在将军名单中。

余天云1906年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11月，黄（安）麻（城）起义爆发，时为农协会员的余天云参加起义，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很快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主力营营长。

余天云战功显赫。在鄂豫皖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斗中，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的黄安战役，他出色地完成了打击援敌和突击攻城的任务。

1932年3月，余天云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12师（师长陈赓）36团团副。红四方面军转移川陕的过程中，曾在枣阳、新集、漫川关一带遭到敌军围追堵截，余天云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为部队开辟通道。进入川陕后，在对付军阀田頌尧的“三路围攻”作战中，他率部重创敌军。在一次战斗中，他率两个连打退了敌人一个多旅的轮番进攻，激战三昼

夜，歼敌1500余人。彼时，红四方面军的猛将与之相匹配的，还有同在12师担任团长的许世友（34团）。但后来，许世友无论在脾气方面还是酒量方面，都输于余天云。余天云其人，由此可见一斑了。

在红军的战史上，有一个经典恶战，即当年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遇到国民党重兵“围剿”。在柳林河，卫立煌的八万人马与红四方面军的两万主力遭遇了，于是爆发一场恶战。那场战斗之激烈，多年后仍让参与者心生寒意。当时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坐镇柳林河指挥所，突然一股敌人突破红军阵地，直向指挥所扑来。就在这关键时刻，余天云带兵火速救援，经过一番厮杀，才使得红四方面军的首脑们免于危难。由此可以想见，彼时的余天云，有着怎样的光环。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召开木门会议，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27岁的余天云得到擢升。余天云身为军长，不辱使命，依然身先士卒，因此多次负伤，而战功尤为卓著。

致命的先天缺陷与个性缺陷

余天云的悲剧，主要源自自身的缺陷。

没有人会质疑余天云作为红军一员猛将的存在，当年他的英勇和指挥才干得到了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的认可，张国焘、陈昌浩等把他作为“游击天才”来称道。

所谓先天的缺陷抑或自身存在的缺陷，不外是后来人们批评张国焘等的“土匪主义”和“军阀主义”等。表现在余天云身上，一是作风霸道，动辄骂人、打人，甚至以枪毙唬人。张国焘率军南下后，274团前任团长周时源在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出于对朱德总司令的热爱，将自己缴获的一头骡子送给了朱老总。余天云听说此事后，竟大骂周时源，还派人揍了周一顿。

二是余心胸狭窄，容易猜忌、忌妒。杜义德将军

回忆说：在一次战斗后，时任30军89师政委的杜义德负伤住院，出院后被调往31军，闻讯赶来的余天云对杜义德说：“你要去31军，得把30军的枪还给我。”原来余早就看中了杜的那支20响的驳壳枪。杜回答：“枪是我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凭什么交给你？”余说：“枪是30军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余天云不仅扣下了枪，连人也扣下了，还跑到张国焘那里告状。杜义德最后被撤了职，他心爱的手枪也变成了一枝长枪。

三是余重视打仗而蔑视政工工作，主张“枪杆子第一”。在他看来，只有打仗才能消灭敌人，政治工作可有可无，于是动辄把部队中的政工干部骂得狗血淋头，而他的口头禅则是：“军事能打仗，能消灭敌人，你政治工作能消灭敌人吗？”

大闹“红大”，惊动刘伯承

1935年9月，在红四方面军的一次大会上，总政委陈昌浩特意表扬了何畏军长的红9军，这让余天云非常不爽，余牢骚满腹，情不能已，便破口大骂。在座的张国焘本能地警觉起来，当场宣布撤销余天云军长一职。不久，又将他调赴红军大学“学习”。当然，为了安抚他，又给了他一个高级指挥科科长职务。

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由原红9军军长何畏任政委（后为校长），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也因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而被贬来任总教官。作为学员的余天云本来就一肚子气，加之何畏和自己同样是个军长，两人关系本就不好，此时却要受他的领导，余便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时不时地发脾气。

余天云还在学校不寻常地摆谱。余天云此时在“红大”的高级指挥科，说起来只有30来个学员，实

际人数却多达100多人，原因就是余天云除了带着军长原来配备的人马外，还随身带着一个机枪排作为卫队。当他去听课时，这支卫队就在临时教室旁放哨警戒，可谓霸气十足。

“红大”有这样一个“刺儿头”，搅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当时，彭绍辉（上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课，此时作为学员的余天云借故发难，竟在课堂上冷嘲热讽说：“一个被撤了职的破参谋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什么劳什子的军事理论，打胜仗就是硬道理，老子不学习照样打胜仗！”别人畏惧他三分，不做声，他却更加横了起来，让一帮子警卫人员呼啦啦地冲进课堂，最终惊动了刘伯承。刘前来出面制止，而余不识相，又说了许多夹枪带棒的话。这下刘伯承真的生气了，他大喝一声，当场让人下了余天云及其警卫员的枪。

蹈水悲剧发生之后

余天云大闹“红大”后，刘伯承从其傲慢、跋扈的行为里感到革命队伍中流氓无产者习气的嚣张，特别在红四方面军干部身上，更为严重。他认为应对此展开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党性教育。刘伯承同时感到：发生在余天云身上的问题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张国焘任人唯亲和搞愚民政策的恶果，是“张国焘路线”的体现。于是决定拿余天云这个典型开刀，遂撰写了一篇文章《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发表在1935年12月16日红四方面军的《红炉》第1期。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反响。当然，这也让余天云耿耿于怀，在他看来，刘伯承在政治上并不“可靠”，是被张国焘发配到这里来的，因此不把刘伯承放在眼里，竟公然掏出枪，气势汹汹地要和刘伯承拼命，并不断谩骂。这时，就是同一部队的何畏也看不下去了，出面制止，而余竟不服，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结果惹得刘伯承大怒，愤然表示：学校“不处分此人，决不再上课”。张国焘闻讯急忙赶到学校，召集全校讲话，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余天云，又“挥泪斩马谡”，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并当众命令警卫员缴了他的武器，随即关进禁闭室反省。

事发之后，余天云情绪十分消沉。不料雪上加霜，同他的坏脾气差不多的妻子刘伯新（安徽六安人，穷人出身，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第二团团副），过草地时见其下属饥饿难耐，捕杀了藏民的一头牦牛，结果藏民上告到张国焘那里，张执行军法，枪毙了刘伯新。此事传来，余天云万念俱灰。还有人说，何畏对余天云的死也要负一定责任，在余失势时，何视余为犯人，行军时强令余背米。余难以接受，以行动相对抗，故意制造麻烦，让他走他不走，让他骑马他不骑，还一路叫嚷：“何畏当政委，凭什么我就当学员？”战士们没有办法，只好用担架强行抬着他走。

就这样，1936年4月，当部队行至激流边的铁索桥时，余天云也被战士们抬着走到了桥心。突然，余天云大骂了一声：“去他娘的！”一个翻身，赌气跳到江水里。

此时，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只有30岁。据说毛泽东闻之曰：“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余天云蹈水后，尸体被打捞上来，安葬时张国焘讲了话。他首先痛悼余天云的死，并褒扬其过去的战功，称其多次负伤，不惜以个人的牺牲为革命争取胜利。随后张国焘又强调：“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应该说，张国焘的这番话还是中肯的。张后来也承认“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然而西路军失败之后，特别是张国焘叛变后，有人认为余天云的死是由于张国焘的迫害，这则是不实之词了。

1945年中共七大，余天云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余天云的悲剧已渐被遗忘，但党如何培育、管理自己的干部，如何让他们克服缺陷、避免错误，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特长及多作贡献，是今日仍需思考的话题。